联合国老年人权利问题独立专家罗莎·科恩菲尔德·马特女士在中国访问时的发言

2019年12月3日星期二当地时间14:30，中国北京100600亮马河南路2号联合国大楼，在对中国进行的访问结束之际，于记者会上对于初步调查结果的公布。

2019年12月3日 北京

***注：新闻稿原文为法文，如有不一致之处，以法文版为准***

各位记者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作为负责促进改善老年人权利的联合国独立专家，我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开始于2019年11月25日并于2019年12月3日正式结束。作为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报告的独立专家，我负责就世界老年人权利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给出相应观点和陈述。

独立专家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机制的一部分，由人权理事会任命，对各自工作领域进行评估并每年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 独立专家是一个荣誉职位，我不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我的工作也是无偿的。

首先，我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感谢，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我的访问请求，让我能够到中国来，本着对话与合作的精神理念对老年人权利，机遇，需求和所面临的挑战做出评估。同时，也向中国政府在访问前及访问期间的友好合作表示感谢。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联合国驻地协调员，联合国各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办公室表示感谢。有了他们在整个访问考察期间的辛勤付出和全力支持，我的任务才得以圆满成功。

访问期间，我会见了许多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国家老龄办公室代表，中国老龄协会代表，民间社会保护组织，各界专家学者，私营企业，社会工作者以及与老年人一起工作的志愿者们，也会见了来自北京，上海，常州和深圳的老年人团体以及老年人组织。此外，我还走访了科技公司，与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了解了针对老年人开发的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及信息集成系统为支撑的新兴辅助技术和数字化健康服务技术。这是我的荣幸，也是一次具有丰富教育意义的经历。

我还走访了许多养老院，保健中心和相关机构，以及老年公民大学，并与社区和地方机构的负责人代表进行了会面。

请允许我对所有抽出时间与我会面交流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分享一下访问的初步结果和临时意见。以下所讲的问题我都会在我的报告中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并于 2020年九月交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下面所提到的问题并不是我报告中的所有问题，也不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部措施。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先来看几组人口数据**

截至2018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49亿以上，占约14亿总人口的17.9％。 在2.49亿人中，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总数为1.66亿，占总人口的11.9％。 [官方统计]

预测表明，**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达到**4.83或4.87亿（取决于来源），即约占总人口的34.9％，超过总人口的1/3。**

数据本身就会说话。

此外，在人口增长放缓，低出生率和更长的预期寿命的作用下，劳动力人口所占百比将下降。根据联合国预测，这将导致2050年老年人的抚养比增加三倍以上，达到44％。

这种与年龄有关的**结构性变化**自然而然地引发了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问题，即如何在减少不平等现象，确保代内之间以及代际之间资源重分配的公平性的同时维持和改善福祉。当国家发展时，公民可以从社会，经济和科学进步中受益。然而，在所有社会中，总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这些资源。正是这些资源的再分配体现了社会内部的不公平。

在人口统计学上，主要有两种类型的不平等：一个是代内不平等，就是在一代人内部之间的不平等， 主要与社会经济，种族和性别的相关因素有关。一个是代际不平等，是在代代之间的不平等，是不同届人口之间的不平等。

总之，为确保代际平等而重新分配资源对于促进社会团结，世代团结以及解决**老年人贫困问题**至关重要。

女士们，先生们

值得称赞的是，中国政府已经针对老年人**保护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于1996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于2018年12月29日进行了第三次修订。 该法针对老年人群体，在各个方面进行了规定，例如照料，援助，社会保障和福利以及社会服务等。 该法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针对老年人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第45条的获得物质帮助权利以及第85条的获得照料的权利进行了完善和具体化。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对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也进行了规定。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中央和地方各级的复杂法律框架反映了政府对老年人的重视。

政府在“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所作出的努力和相关目标的实现也体现了政府对老年人的重视。在“十四五”规划即将来临之际，制订一项针对老年人的具体政策对于确保更好保护老年人权益至关重要。我请中国政府考虑在以往关于老年人的法律政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一项系统性政策。我认为，制订一项系统性政策对城乡老年人的不同情况进行差异性，针对性的保护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将提高现有文书，法律和政策的效力，以满足边缘弱势群体的需求，例如农村地区的老年妇女，残疾人，老年痴呆患者和患有其他疾病的群体。老年人群体的多相性意味着针对弱势群体的差异性研究是非常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各类数据的收集也可以进一步的完善。

我认为，在这方面，我的这次访问和与中国政府的对话非常及时。因为这使我有机会强调，任何关于老年人的政策及行动都应该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案是把个体和个体权利置于中心位置的。 现有的国际人权框架，尤其是包括联合国关于老年人和主要的人权相关文书和原则，应对政府在相关方面的工作和努力发挥指导作用。

在此，我向专门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机构致敬，即中国老龄协会和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他们在关于老年人的政策活动的落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我在拉丁美洲的经验，拥有独立部门间的协调机制至关重要，它也可以极大地简化政策的落实和促进国家政策的实施。通过采取多学科的方法来解决老龄问题，通常有助于改善该国老年人的各个方面的权益。

有效方案设计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数据和分析的可用性。 我不知道中国最近是否对老年人的权利进行了研究，但是这将衡量所采取措施的有效性。 尽管我注意到统计数据是按年龄分类的，但我还是鼓励要进一步关注老年人，并且如上所述，我希望进一步分类数据以反映60岁以上年龄组的异质性。

同样，关于**阿尔茨海默氏病**以及其他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症，帕金森氏病等）的总体方案设计也是很好的对策。 这些条件的普遍性对于评估，分析和收集各类数据也很重要。 这将有助于完善战略规划和完善护理系统，尤其是对患有慢性疾病和残疾的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基础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已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对个人的社会保护方面，2005-2015年期间几乎实现了城乡地区医疗全覆盖。 在2009年推出的针对无退休金的农村居民的政策影响下，退休金的覆盖范围从不到2亿增加到8.5亿左右。

在养老金方面，城市养老保险的受益人数量（即已付福利）从2000年的3200万增加到2015年的9200万。 也就是说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2000年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有养老金，而到2015年，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有养老金。养老金的金额也很可观，因为2015年公共养老金约占平均工资的50％，经济替代率44％[养老金的经济替代率：人均养老金与和人均GDP之比]，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相比，表现还很不错。

女士们，先生们

最近几十年来，独生子女政策给家庭结构，尤其是城市的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变化。

今天，由4个祖父母，2个父母和1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已经成为标配。 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传统大家庭显得日渐衰微。 另一个现实是，在经济层面上，老年人会帮忙照顾孙子来帮衬他们的子女。 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位来自智利的外祖母，我也做过这些事情。 然而，归根结底，老年人的积蓄始终不足以支撑他们所需要的护理和照料。

此外，我建议重新考虑**现行的“户口”制度**，该制度将家庭的登记限制在特定的出生地，并将社会福利与之联系起来。 但是，实际上，有许多农村居民在城市中居住，同时又在循环利用其农村“户口”相关的社会利益。 而返回原籍地的老年人却常常无法要求到他应有的权利。

尽管我知道当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在处于过渡时期，但我仍然建议对于**弱势群体应该施行无条件的不需个人缴费的养老保险制度。**那些为养家糊口而工作，抚养孩子而且还要继续照顾年长父母的人，通常是农村地区的妇女，但也有男人，他们往往要面对贫困和不安全感。当前的社会养老金是一种个人储蓄账户系统，就其本质而言，它要求一个人必须符合居住条件的一系列标准（“户口”系统）还要有15年的缴费。即使这些可以被完善修正，但是最终都还是会成为障碍。我鼓励政府进一步巩固迄今取得的进展，并以更系统的方式解决充分性，平等，可转让性和可持续性的问题。

此外，借此机会，我呼吁要对“**年龄主义**”（**âgisme**）这个词进行翻译，翻译时要为年龄而对某些个人或者群体产生的偏见，有时还包括某种歧视。这有时是偶然情况，有时则是习惯性的。这个说法是在1969年由罗伯特·内尔·布特勒（Robert Neil Butler）提出的，考虑它的含义。在我看来，创造一个专有名词是很重要的。“年龄主义”指的是因用以指代对老年人的歧视。尽管反歧视的方法有很多，它们也起到了禁止歧视的效果，但我仍然呼吁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正视这个问题，我建议针对“年龄主义”出台政策以及法律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社会和谐以及互相尊重。因此，忽视对老年人的赡养被视为一种暴力行径。如果家庭成员不在饮食起居上对老人尽义务，这同样也是不赡养的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这方面的地位十分重要，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旨在打击对老人施暴、虐待、苛待、漠视行为的措施也重要。我对政府采取的措施表示祝贺。但我仍鼓励政府做更多的事情，激发公众在这方面的意识，并提高公众的关注度。这可以采取对法官、律师和检察官进行培训的形式，这对于保障针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的调查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可以向社区发出警示信号，即对老年人的暴力和虐待是一种严重犯罪，并会一律依法处理。

虐待老年人的现象屡见不鲜，这表明仅有规范性措施是不够的，需要其他的辅助措施和机制，以便搜查、举报和预防各种虐待老人的情况，不管老人是在养老院里还是在家里。为了帮助个人、家庭、机构护工和社区团体了解虐待老年人的问题，发现有风险的老人，并在适当情况下做出响应，通常来说，相关的协议和程序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更好地提高家庭和机中的护工在这方面的意识，以预防并发现对老年人施暴、虐待和忽视的现象。

此外，政府还制定了针对老年人的**特殊优惠政策**，重点放在医疗保健，交通，商业服务，博物馆，文化活动等方面。这些措施很重要，对老年人很有好处。他们促进社会包容和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尽管法律将老年人定义为60岁或以上的人，但我发现为中国老年人设计的具体福利，其门槛年龄会根据当地法规和不同的计划做出调整，60岁并不是统一定义为老年人的标准年龄。不仅城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而且根据法规的目的不同，这个年龄标准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协调。

我有幸参观了**各类老年人的住所，社区护理中心和养老院**。其中一些机构以其规模和标准给我留下印象深刻，例如泰康养老社区，该中心的标准很高，需要大量个人资源。 但是我也看到了各种社会福利机构，包括综合保健中心和托管中心，例如劲松老年家园或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都为老人提供综合康复服务。我了解到，老年人的住房和生活条件正在转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独居或与老伴生活在一起，从而摆脱了传统的家庭模式。

关于**卫生保健**，这些活动分为两个主要方面：医院和初级卫生保健设施。市区和乡村的病人与医生的比例分别为每千人3.2和1.4。近年来，老年人专用的保健机构的数量稳步增加。

大量残疾和生病的老年人都需要护理。这意味着**对医疗服务、护工、长期护理和康复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家庭护工和家人护理需要通过更正式的长期护理手段得到更大的补充。幸而还有**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我经常推荐的一项措施，它是满足日益增长的护理需求的关键要素。要注意的是，国务院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已将为卧床不起的老年人提供长期护理和康复服务作为一项优先任务。因此，我想在此补充一点，我强烈敦促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更多投资**，并在学术界对老年病领域的医生和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同时还要发展在老年病和老年学科方面的培训，提高科学技能。我真诚地认为，这一领域需要优先考虑。

我还要补充一点，中国在为老人提供“老年大学”方面做得很好。我本人于2004年赴中国参加了一次国际性会议，其主题是关于老年大学以及老年人的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我本人也在拉丁美洲参与了这类机构的创建工作，并且我非常清楚，这类机构在中国办的格外成功。自1983年中国兴办第一所“老年大学”起，中国已经建立了约7万所其他机构。去年，60岁以上的中国人中有3％以上在机构里进行了注册。有些学校是专门留给退休干部的，而另一些则向所有人开放。大多数费用由政府提供，平均学费为每季度200元人民币（31美元）。我有幸参观了深圳一所设备齐全的现代化“老年大学”，这给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最后，我要感谢当地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使我能与技术公司会面，见到了新兴辅助技术的研究人员，以及老年人医疗护理数字化领域的研究者。

与该领域公司及研究人员的交流是至关重要且具有建设性的。我了解到，老年人服务数字化是一个优先事项，被视为蓬勃发展的市场。《十二五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提出了“ **90+7+3老年人护理模式**”，这意味着90％的老年人应该得到家庭护理，而7％的老年人应该得到社区护理，剩下3％的老人则由机构护理。尽管达成这个总体目标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但预计人工智能和面部识别技术将在老人的医疗护理中发挥关键作用。指导原则是对个人数据、生理数据、行为模型进行联系与整合，从而进行全面分析，制定个性化的和监测服务，包括更准确地预测健康状况和护理需求。当然，我也很注意解决数据保护、信息自决和知情权等问题，特别是在涉及到老年人时。在这方面，我想请您参考我的2017年主题报告，该报告考察了辅助技术，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对老年人基本权利的影响，还包括了在该领域提出的大量有用建议。（A / HRC / 36/48）

值得强调的是，人们对老年人的人权的认识正日益提高，联合国机构和国际合作组织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巨大努力。我衷心呼吁整个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各成员国的工作团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界、以及国际合作组织成员在他们的项目中都能考虑到老年人，并且在所有合作策略以及在中国实施的项目中，考虑到老年人的年龄。此外，联合国为支持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英文缩写SDG）而进行的努力,其重点应放在通过跨部门和系统性的方式实现老年人的权利，以真正确保不漏掉任何人。

最后我要重申，我非常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我的访问请求，这次访问使我意识到中国为改善老年人的状况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国际组织与多边主义局的合作以及建设性对话。此外我还希望，我的访问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和人权高专办的合作机会。我也希望，我的访问将有助于支持各国政府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而作出的努力，特别是在消除老年人贫困，以及增进和保护老年人的人权方面的努力。同时，这也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题，即“**不让任何人掉队**”。

正如我在开头指出的那样，我今天的发言只是初步讨论，肯定不能涵盖所有问题。我将更详细地分析访问期间收到的信息，并把结论写在将于2020年9月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

我再次申明我将继续与中国政府对话的承诺，并期待能本着合作精神与中国共事，以确保中国老年人能够充分享受其人权。